

□钱贝

古董铁券从何而来

钱用勤手上的丹书铁券，来自唐朝时钱家的祖宗钱镠。

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。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(852年)，卒于后唐长兴三年(932年)，他本来是自称大越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的手下将领，乾宁二年(895年)二月，董昌在越州(今浙江省绍兴市)自立为王，之后封其为两浙都将。但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“伪命”，反而立即起兵讨伐董昌，大破叛军，于乾宁三年(896年)攻克越州，生擒董昌，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立下大功。

唐昭宗大喜过望，于乾宁四年(897年)八月四日，封其为镇海、镇东两节度使，为表彰其忠义之举，特赐给钱镠丹书铁券。

这枚铁券主体由铁铸成，形状就像筒瓦，中穹旁垂，中间刻有“惟我念功之旨，永将延祚子孙。使卿长袭宠荣，克保富贵。卿恕九死，子孙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”等词。因刻字填以真金，又被称为“金书铁券”。凭此券可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，子孙后代三次死罪。若犯寻常刑罚，官府不得问贵。

钱镠叩谢皇恩，将铁券奉为家族至宝，由家族世代守护传承，中间虽曾因战乱不幸遗失，但很快便物归原主。传至明朝，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钱镠的十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，因“田粮案”获罪，被革职查办，面临严惩。其子钱铤在危急关头，千里迢迢奔赴京师南京，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铁券，并哭诉历代祖宗功德。朱元璋听后，不仅饶恕了钱用勤的死刑，还下令归还了此前抄没的钱财家产。

这隔了几百年的铁券为何还能得到朱元璋的认可?要知道，连得到朱元璋亲手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明初功臣们，也有不少最终还是被下狱斩首，不能逃脱一死。史书并未记载当时朱元璋的具体想法，但从种种记录中，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原因一二。

“模范”铁券

“钱氏铁券”能够发挥作用，首要原因在于，这枚铁券在钱用勤出事以前，就已经获得了明王朝的官方认可。

明朝建立伊始，朱元璋便考虑如何封赏其手下有功之臣。古往今来，封赏开国功臣一直是一个难题。赏薄了，寒了将士之心，恐生怨怼;赏厚了，又怕功臣恃功骄恣，尾大不掉，威胁皇权。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，决定重启“丹书铁券”作为封赏功臣的手段之一：“(朱元璋)将剖符(符即铁券)封功臣，召宋濂议五等封爵，宿大本堂，讨论达旦，历据汉唐故实，量其中而奏之，上皆嘉纳焉。”

然而，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青睐丹书铁券这一嘉奖形式，铁券的形制在当时已经出现断代，铁券的制作标准成为一个难题。翰林学士危素进言说，台州钱家留藏有唐代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，可以用来参考。朱元璋便

一块唐朝“免死金牌”如何救了个明朝人?

“丹书铁券”，这个词对于爱看影视剧的人来说，应该并不陌生。它还有一个更大众，更耳熟能详的名字——免死金牌。在荧幕上，它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焦点：一位忠臣良将蒙受冤屈，命悬一线之际，突然一道黑影骑马飞驰而来，大喊一声“刀下留人”，随即捧出免死信物丹书铁券，顿时让反派瞠目结舌，不得不停止行刑。在真正的历史中，丹书铁券的“免死功效”能否起作用，可就复杂得多了。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其实主要看的还是皇帝的意思。

按照常规，“丹书铁券”由本朝皇帝赐本朝大臣，遇到改朝换代，也就失去效力。俗话说，“前朝的剑斩不了本朝的官”，过期的丹书铁券大多只能起到文物的作用。但令人称奇的是，明朝居然有人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券成功免去了死刑。这人名叫钱用勤，时任江西建昌知府，他拿出的丹书铁券，是一件五百岁的“老古董”。



钱镠铁券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，并“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，礼部尚书牛亮，主事王肃观之，镂木为式”。最终确定了明代铁券的形制。《明史》载：其制如瓦……外刻履历、恩数之详，以记其功；中镌免罪、减禄之数，以防其过。字嵌以金……各分左右，左颁功臣，右藏内府，有故则合之，以取信焉。

由此，这枚古老的铁券在明初国家礼制建设时，就已经被动地完成了“验明正身”和“价值确认”的程序，其真实性 and 历史地位得到了明朝最高统治层的官方背书。

这意味着，当钱用勤之子钱铤怀揣铁券上京鸣冤时，他所出示的并非一件来历不明、需要费力考证的前朝遗物，而是一件早已本朝官府记录在案、承认其历史合法性与特殊意义的信物。

铁券自西汉出现起到隋唐五代，它的功能从汉代赏赐功臣的荣誉恩信、世袭爵禄的凭证，到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出具有免死免罪的作用，再到唐代进一步完善，对免死的次数与范围都有了更细致的规定。在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，由于统治者滥发，铁券的信誉直线下降，免死功能与权威性不再为赏赐者与被赏赐者双方所认可。两宋及辽金元时期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都不再视铁券为具有实际效力的“免死金牌”。

大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胡惟庸、蓝玉、李善长等案

的发生，令手握“免死金牌”的开国功臣们也“难逃一死”，这对大明刚刚重建的“丹书铁券”制度的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打击。通过赦免非开国功臣的钱用勤，朱元璋可以展现出他守护的不是某个具体功臣的利益，而是“帝王一诺千金”这个抽象的政治道统。这有助于安抚广大士绅和民众，塑造自己并非一味酷烈，而是恪守传统价值的明君形象。

家族的品牌效应

并且，钱氏家族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，数百年来，都有着“忠义”的美名。钱镠曾多次出兵勤王外，死前曾为子孙留下十条家训，其中前三条都与忠义侍君有关：

- 1.要尔等心存忠孝，爱兵恤民。
- 2.凡中国之君，虽易异姓、宜善事之。
- 3.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，如遇真君主，宜速归附。圣人云顺天者存。又云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免动干戈，即所以爱民。如违吾语，立见消亡。依我训言，世代可受光。

钱家后人也的确继承了钱

镠的遗训，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年)，钱镠之孙钱俶依照钱镠“善事中国，弗废臣礼”的遗言，为了表明归顺宋朝的心意，他将城墙全部拆除。乾德二年(964年)被授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封忠懿王。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，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，他又遵照祖上的训导，审时度势，主动将当时所辖13州、86县、55万多户、11.5万士兵“纳土归宋”，宋太宗封他为南阳国王、邓王。

钱氏家族遵奉“中国之君”的家风，是历代统治者乐于看到，并竭力宣传的。所以，朱元璋在处置钱用勤时，也难免要顾及这一点。

罪名也有玄机?

另外，钱用勤所犯之罪是“田粮之罪”，这是其能够获赦的又一个关键因素。

“田粮案”通常指在登记、征收或运输税粮(主要是田赋)过程中出现的差错、亏空或舞弊行为。

丹书铁券的免死功能通常有其限制，按照历代惯例，其对于“谋反”“谋大逆”等“十恶不赦”之罪是无效的。但钱用勤所犯的“田粮案”，无论是因为管理不善、下属牵连，还是确有贪墨，其性质通常不属于直接威胁皇权和国家根本的“十恶”范畴。虽然在明初，尤其是朱元璋推行“洪武新政”、严厉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，这也是比较严重的罪过，但毕竟在法理上留下了可以援引特权进行宽宥的余地——如果钱用勤是被控谋反，那么即便有十块铁券，恐怕也难逃一死。

唐昭宗赐券诏书中明确写道：“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。”所谓“常刑”，指的就是一般的、非极端性的刑事处罚。田粮罪虽然严重，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，仍可被视为官吏渎职或经济犯罪的一种，属于“常刑”领域。这使得援引铁券中“有司不得加责”的条款具备了相关性。钱铤上京申诉的核心依据，很可能正是强调其父所犯乃“常刑”，依祖宗铁券，理应得到宽免。

对朱元璋而言，处理此案是一个权衡。一方面，他需要严明法纪，惩治贪腐；另一方面，他也要展示对历史信物的尊重、对忠良之后的怀柔，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超越法律的恩赦之权。赦免一个田粮案官员，相比于赦免一个政治犯，其政治风险和对现行法律的冲击要小得多。这使他能够在不严重损害整顿吏治大局的前提下，完美达成“施恩”与“重信”的政治目的。

总而言之，钱用勤的幸运，是祖宗遗泽、家族清誉、历史功绩与当下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枚丹书铁券，既是实物凭证，更是钱氏家族累世忠义精神的象征。钱家后人一直小心珍藏着这枚铁券，并在后来捐献给国家，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。1959年，铁券被移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(今中国国家博物馆)，成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方便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铁券背后的历史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